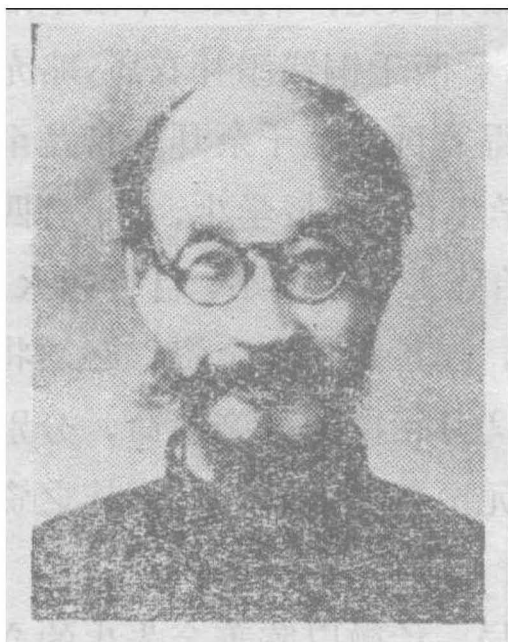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家

## 柳诒徵自传及自述



柳诒徵先生遗象

柳诒徵(1880—1956)字翼谋,亦字希卅,晚号劬堂,又号龙蟠迂叟、益山髯。江苏省镇江人。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家、书法家、图书馆事业家和爱国主义者。1916—1925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文史教授,1927—1948年任江苏省国学图书馆馆长。抗战期间,曾先后任教浙江大学、贵州大学、中央大学。兼任国史馆纂修,1948年任前中央研究院

院士。解放后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。专著已刊行的有《中国文化史》、《国史要义》、《东亚各国史》、《历代史略》、《国学图书馆小史》、《中国版本概说》等,其他论著发表在《学衡》、《史地学报》、《史学杂志》、《国风半月刊》、《国学图书馆年刊》、《国史馆馆刊》等刊物的学术论文共达一百卅余篇。未刊行的文集、诗集、诗余、题跋、随笔、杂俎、日记等手稿本均保存完好,亟待整理汇编,刊行问世。现在发表其解放初所撰《自传》和《自述》两稿,以飨读者。

——编者

## 自 传

1880年2月5日(清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)生于江苏省丹徒县(今镇江市)城内第一楼街鲍宅内一小屋中。父亲柳泉教学生,每月收入止五千铜钱。母亲带着我七岁的姊妹抚养我,一切炊爨浣洗都是一个人做。

1885年父亲病故,母亲带着我们两个小孩,跟着外祖家苦度。当时亲族及慈善机关每月给我们母子银元二元,铜钱二千做生活费。母亲每月送二元与外祖算房饭钱,剩两千铜钱添补衣履,略充零用。不足则做针线售钱,亦不过月得数百文至千余耳。自是至1896年皆恃津贴生活,至诒徵考取县学生员,教授学生,每年有四十银元,及书院膏火多寡不等,母亲始辞去各项津贴,自行起火。但念念感谢亲族赙济及社会慈善机关,属诒徵稍有余资,必须将此十数年津贴之款归还。至1918年12月诒徵依母亲遗命,分别送还镇江之完节堂、恤嫠会、儒嫠会百元至数百元不等。同族之资助者,亦约计其数,助其子弟之学费。

1900年变法兴学,南京开编译书局,诒徵以陈善余先生的介绍,至局中编教科书,月薪四十元。1902年随江阴缪艺风先生至日本,考察教育数月。归国后仍在书局编书,次第与友人创办南京思益小学,江南中等商业学堂,及镇江大港小学。办商业学堂时,月薪八十两,遂辞编译局事。后又兼江南高等学堂,两江优级师范教习,月薪一百二十两。在书局及各校所编之书有《历代史略》、《中国教育史》、《中国商业史》、《商业道德》、《伦理口义》等。

1911年任镇江县临时县议会副议长,及镇江中学校长。议革农民纳粮半费事,与当时县长齟齬,剔除学校庶务会计私弊,与校中职员相左;至夏间遂辞职,赋闲。翌年,至北京任明德大学斋务

主任兼历史教员，稽查学生宿舍，晨夜往返，时有不周，遂辞斋务之职。

1915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国文历史教员，兼河海工程学校教员。翌年，辞河海，专任高师事。嗣高师改大学，任历史教授，与同事诸教授创办《学衡》及《史地学报》杂志，提倡学生研究，反对教育界贪墨。至1924年遂为拥护贪墨者所排斥，赴辽宁，任东北大学教授，郭松林事起南回。翌年，任北京女子大学教授，兼北京高等师范历史课程。自任南高师迄北京各校中间编著《中国文化史》、《东亚各国史》及《中国经济史》、《中国财政史》、《印度史》等。

1927年任第四中山大学筹备委员，励行学区制。夏间，专任国学图书馆馆长，先后达十年。1937年倭寇侵华，寄善本书于安全地带，运丛书、方志等三万本至兴化。翌年，辗转至江西泰和，在浙江大学讲学，猝然中风，幸治疗痊愈，遂由湖南、广西，至香港，道上海，再返兴化，避警住竹泓港。

1942年又赴沪，经浙、赣、粤、桂、黔至重庆。顾孟余聘任中央大学历史研究导师，遂住柏溪分校，撰《国史要义》，间赴大学讲演；及出席教育部学术评议会，嗣被聘为部聘教授。

1945年秋自重庆返南京，复任国学图书馆馆长。时书笈、器物荡然无一存。房屋亦为学校借用。各方接洽，努力访求，矢死力争，幸将馆书收回十九万册，房屋器具收回十之七八。1948年秋，以年届七旬，申请退休。至翌年春始获批准，遂赴沪暂住，迎接全国的解放。1949年9月上海市市长陈毅聘任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，幸获学习马列主义理论，矢志努力工作，第以所学陈旧，目眊体衰，每自省察，愧负滋甚。

1951年于上海

## 我的自述

### 一

我自幼从母亲读四书、五经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周礼》，以及古文、《古诗源》、唐诗。天天要背诵。自七岁至十五六岁，逐日念生书，背熟书，止有腊月廿日以后，正月半前放学，可以自由看书、抄书、游戏。其余读书之日，自天明起即背书，各书不背完，不能吃早粥。我的书读得越多，越念不熟，背书的时间越长。直到我十五岁大病之后，我母亲怕我夭亡，读书的课程才减轻了。彼时我虽读了许多书，也不知道如何讲解，更不知道如何讲求经学；偶然看看《纲鉴易知录》或《四库简明目录》，也不知道如何讲求史学及目录学。但我听见本地有许多人家有什么书，我就要想法借来看或抄；所以自十六七岁起，向镇江各家借抄《御纂七经》中的三礼一部书，过录惠定宇、张皋文批的《汉书》等，也都是莫明其妙。我父亲的学生陈善余（庆年）听见我很好学，时常找我去谈论。我就从他得到许多讲学问的门径。陈氏的朋友赵申甫先生（勋禾）也赏识我，常和我谈镇江的掌故，以及清朝许多学者的故事。我在廿岁前后，最得此二先生之力。到了廿三岁，陈善余介绍我到南京编译书局，受业于江阴缪艺风先生门下，我就由此常在外乡，在镇江的时候很少。几十年间见到清季及民国许多硕学名人。自己虽然根柢浅薄，也随时跟着若干人前进。陈善余最深于史学，劝我不要专攻词章，因此我也就不大很做诗和骈文。陈的志愿是讲学不做官，我也就只愿讲学不做官。在译书局和常熟宗受于（嘉禄）同事，听他常讲桐城老辈讲学问文章的方法，也就渐窥散文的门径。那时译书局在南京

中正街(今日下路)祁门会馆,和义宁陈伯严先生(三立)对门,时常亲炙,粗闻其诗古文绪论。陈戚通州范肯堂先生(当世)常游金陵,寓居陈家,我也常请教他。同时通州名人张季直先生(謇)做文正书院山长时,我应过一回考试,他就赏识我。后来他因有人请他做一部书的序,他托缪先生找一个人代做,缪先生叫我代做,他看了也称很好,所以我就常去拜见他。及至办商业学堂,张先生担任过一次监督,更和我是宾主了。张先生办南通师范学堂,要请我到通州教书,范先生也力劝我,我因在缪先生门下,待我极好,我不忍离开缪先生,婉言辞却。但因到通州之便,与江易园先生(谦)相晤,江先生告我以“三不敷衍”宗旨:一不敷衍自己,二不敷衍古人,三不敷衍今人,我为之极端倾倒。后来江先生任高等师范学校校长,请我教国文。我更常听到江先生许多名论,可惜他因病辞职,在校时间不久,否则他的人格感化,造成南高学风,真是了不得的。

## 二

我何以学会写篆字?我舅父的朋友孙永之先生(维祺),真、草、篆、隶都写得好,常到我舅父书房内闲谈。我看见他写篆字,我就要学着写。他说不是学着写,要看《说文》,才晓得每个字的来历。我那时不知《说文》是什么书,听见有一位张先生家有这个书,就向他借。他有一部江阴祁刻的《说文系传》,不肯全部借与我,祇肯一本一本的借。我借得一本,就将每字抄下,再去换第二本。我自幼读过《尔雅》,也就将《尔雅》一字一字照《说文》写去。这是我学写篆字的经过。后来孙先生去世,家境不好,他生平所得的碑帖亲手装贴,有数十百本,我买得数十本,内有《西狭颂》、《石门颂》、《尹宙碑》、《史晨碑》诸碑,我就学著写分隶。后来见著同乡吴芷舲先生(诵清),佩服他的篆隶,在南京时常去请教他。后来又见到李梅庵先生(瑞清)、欧阳竟无先生(渐),遂更学写钟鼎、魏碑和《泰山金

刚经》等，垂老无成，愧负诸老。

### 三

我自幼受我母亲的教诲，做诗做文不可好发牢骚，专说苦话，以及攻讦他人，触犯忌讳等等。所以平生谨守范围，固不屑以诗文为干谒谀谄之具，亦不敢用为玩世骂人之武器。自在东南大学与梅迪生(光迪)、吴雨僧(宓)等创办《学衡》杂志，始对于当时教育界、学术界加以评论，也止于笼统指摘，绝不诋诌个人。又与学生缪凤林、景昌极等创办《史地学报》、《文哲学报》亦止于平心静气讨论学术，不立门户，不争意气。有一篇《论近人治诸子学之失》(载1921年《史地学报》一卷一期)论及章太炎、梁任公、胡适之等诋毁孔子，崇拜墨子，及九流不出于王官等议论，措词亦极慎重，惧婴诸人之怒。这篇文章披露之后，太炎见了，写信与我，声明从前诋毁孔子之误，承我批评甚感。后来相见，甚为契合。写一扇面赠我八字，是《刘歆传》的“博见疆识，过绝于人”八字。任公过后对我的批评也无反响。1922年冬，任公到东南大学讲学，对我很客气，也曾写一联相赠“所欲者大，独为其难”。适之见面，也很客气。我的学生乘间问适之对我的批评如何？他说：讲学问的人，多少总有点主观。因为他提倡客观，我说他的议论，并不纯是客观也。彼时有人怀疑古代没有夏禹这个人，依据《说文》：“禹，虫也”一句话作证。东大的学生刘揆藜做了许多文章和他们辩驳，我并未参加。但在《史地学报》三卷二期里做了一篇论文，题目是：《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》。因为《说文》是讲字的书，并非是历史人名字典，所以对尧、舜、禹、昌、旦等都不说是某帝、某王，只照字的原始意义说。我也没有提出疑惑或说没有大禹的是某人。后来在北京见到几篇文字，指明我这篇议论不对，我也不再去辩这个是非。

#### 四

予六、七龄时，先妣口授唐人五七言绝，约二百首；次授唐人五言律，约四百首；次授《古诗源》全部；次授《唐诗别裁》，不克竟读，仅读七言律一类。其五七言古诗，则听予姊读三百首中诸篇，亦略能上口。十二三岁时，年终放学，潜至外家楼上阅所藏书，手抄海门（鲍皋）、江干（余京）、石帆（张曾）、小花（李御）诸先生诗，亦学为之。两舅氏应书院试，间有试五七言者，两舅亦命予学制，不自知其工拙也。十七岁应童子试，学使考试，适遇龙侍郎按试，经古有古近体诗一门，煦斋舅氏告濬卿舅氏为予报考，题为《焦山古鼎歌》、《田横岛》、《栾公社》七律，予以小篆书之，幸获录取。复试题为《拟杜工部李潮八分小篆歌》、《润州怀古》七律，阅后试卷评有“未冠能此，可称妙才”之语，出禀两舅氏，两舅氏甚喜，以予所作“有故而去”之八股文，恐不入彀，嗣亦幸获录取，评语亦佳。伯舅曰“学究对汝文，竟能加此美评，吾辈虽欲思一美评不能也”。时在金坛应试之乡先辈，皆知予之能诗。陈心兰先生在试场，口询予若何学诗？予告以实未尝学诗，虽《唐诗三百首》亦未能全读。陈先生曰：“学诗亦不必读选本，宜读专集”。此语予至今犹忆之，不敢忘。

又予十五、六岁时，蒙李亚白先生赏识，并常赴其冬心书屋请教。先生教以阅潘四农《养一斋诗话》及蒋心余《忠雅堂诗》。比在金坛应试始获购阅此二种。又购黄仲则《两当轩诗》及《国朝六家诗》，粗窥渔洋、竹垞之樊篱。在家授徒，手抄韩、杜两集读之。此为予学诗之经过。廿三岁赴金陵编译书局，遂不复用功于诗，偶有游览应酬之作，仅以鸣其兴观群怨之意而已。

在金陵，又见陈伯严（三立）、范肯堂（当世）两先生以诗鸣海内，益不敢云诗，但冀亲炙时贤而知门径耳。王湘绮在宁，尝晋谒叩诗法，王曰：“诗如女子，须有粉黛，又如士夫，须说官话”。予亦

谨识之。时易实甫(顺鼎)偕游胡园,散原指易告予曰:“此诗机器也”。易诗与樊樊山(增祥)诗最速,故陈目为机器,予知陈意,诗不以斗捷贵,故当时不嘲易,亦未与易谈诗,至樊则未一晤也。同时友好刘龙慧、毛元徵、梁公约、李审言、江小楼,徐南州皆擅诗名。予亦不敢与角。第聆其言论,知所宗尚。间阅郑子尹、江弢叔(澐)、金亚匏(和)、黄公度、郑海藏诸家诗,阅《陈石遗诗话》,知有所谓同光体,石遗之为诗话,录公约诗,有予宿北固山联句,予亦不敢以诗投石遗。民国初年在北京,胡子靖尝欲介予晤石遗,予懒未往。至廿年前后,始由曹缙衡介予见石遗,并属予写旧作质之石遗,始采予诗入续诗话。

民国五、六年任教南京高师、东南大学,与王伯沆(濬)共晨夕。王喜谈诗,赣人胡先骕、邵祖平亦暱就。王谈诗,予旁听,久之,亦时有所得。王在龙幡里图书馆手抄《咏怀堂诗》,假予读之。陈散原亦亟称阮。予益知诗不易为,而取径尤不可简。间取吴挚甫评点昌黎、半山两集过录之,并涉猎黎二樵(简)、高心夔诸集,不能如王之用力,任举某家之诗,辄举其名篇琅琅上口也。王又喜谈东野、宛陵二家,予读之,鲜领会,自知用思不能深刻也。

### 附:柳诒徵主要著作目录

日游汇编 一九〇三年高等学堂刊本。

历代史略 一九〇三年江楚书局刊本。

中国商业史 一九〇五年油印本。

中国教育史 一九〇七年铅印本(题黄绍箕撰)。

中国文化史 一九二三年南京高等师范讲义。一九三二年南京钟山书局、一九四八年正中书局先后再版。

东亚各国史、朝鲜史、日本史、印度史、北亚史、南方三国史、南洋群岛史 一九二三年南京高等师范讲义。

国学图书馆小史 一九二八年国学图书馆出版。  
国学图书馆概况 一九三一年国学图书馆出版。  
中国版本概说 一九三一年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。  
国史要义 一九四八年中华书局出版。  
盩山牍存 一九四八年国学图书馆出版。  
青衿周甲述 一九五四年油印本。

## 管仲卒年考辨

林仲湘

管仲生卒年，《史记》本传失载，故前人疑年录亦未收。但他的卒年，《史记》却有两说：一是《齐太公世家》：“（齐桓公）四十一年（公元前645年），……是岁，管仲、隰朋皆卒”；二是《秦本纪》作：“（秦缪公）十二年（公元前648年），齐管仲、隰朋死。”同一史书记载，竟相差三年。孰是孰非？只有再找旁证材料并加以考订，才能确定。好在《史记》中还找得到两条：一是《十二诸侯年表》：“（晋惠公）七年（公元前644年），重耳闻管仲死，去翟，之齐。”一是《晋世家》：“（晋）惠公七年，……今闻管仲、隰朋死，此亦欲得贤佐矣，盍往乎？”按：公元前644年，即公元前645年的第二年。所以这两条材料参证了《齐太公世家》所载是。而《秦本纪》所载误。管仲的卒年应取公元前645年，不取公元前648年。

我们考核古人生卒年所依据的材料，大都经过长期辗转流传，其间讹传、错漏在所难免。因此不能盲从片面的纪载，而应加辨证。